

明代的翻版及其收藏著录

郭立暄

明代继宋、元而起,出版业繁兴,制作了大量翻版,其中的佳槧,受到明清以来藏家与学者的喜爱。学者以撰写书志、题跋记、序跋等形式,登于著录。本文将就笔者所见,胪列明代著名的翻版,梳理其在传统著录的情况。文中部分判定意见,与目前各家著录稍有异同,疏漏谬误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正。

在讨论开始之前,有两点须先作说明:一是翻刻的含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翻刻指将底本的文字照翻下来,行款、字体等方面就不作要求了;狭义的翻刻则要求将底本的形式翻下来,即使不能做到字体亦步亦趋,至少应在行款上基本保持一致。本文所指的翻版,侧重于狭义的理解。二是传统收藏之根柢在宋、元版,限于篇幅,本文所记仅限于收藏著录中混入宋、元版的明代翻版。

一、明代翻版字体之地域风格

相当数量的明代翻版风格继轨元朝:建本多沿袭元建刻的柳公权体,而福建以外地区的雕版,尤其是江、浙一带,多用赵孟頫体。直至弘治以后,始逐渐摆脱这两种字体的影响。

属于柳字本系统的,列举四种: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后集三卷,宣德十年(1435)朱本道刻本,从元大德十年(1306)翠峰丹房刻本翻出。元大德本目录后有“大德丙午中元翠峰丹房刊行”二行,今藏日本静嘉堂;宣德本卷之上末镌有“宣德乙卯九月重阳日金陵洞玄子朱本道重刊印施”字样,字体规仿元本,今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此书另有明前期翻本,与宣德本非一刻,刘承幹《嘉业堂善本书影》著录之“元刻”有黄丕烈手跋二篇者即是,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台图)。观其字体,已露明刊本色,台图定为“明初覆刊本”,当是。台图又藏一明刊黑口本,有鲍毓东跋,则字体方板,或为嘉靖中翻版。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正统十三年(1448)书林王宗玉刻本,系从元后至元六年(1341)日新书堂刻本翻出。杨绍和《楹书隅录》卷四著录之“元本”,即为明王宗玉本。今分藏二处:卷一至十八今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以

下简称国图);卷十九至末今藏山东省图书馆^①。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刘承幹《嘉业堂善本书影》、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著录之“元本”亦均为王宗玉本^②。

《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成化十年(1474)熊宗立种德堂刻本，系从元后至元五年(1339)莒节古林书堂刻本翻出。各家著录之“元刊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四著录者，今藏国图，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六著录者，今藏台图，为真元刻；《嘉业堂善本书影》著录者，今藏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实为熊宗立翻本。

《世医得效方》，明书林魏家刻本，系从元至正三年(1343)陈志刻本翻出，其刊刻时间当在成化之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明初刻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补遗》著录之元刻本，卷第十九至二十补抄，钤有“蒲亭藏书”、“雷井文库”等印，为真元刻，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铁琴铜剑楼元本书影》子部三十六著录之“元刻”、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著录之“元刻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著录有“元至正五年陈志刻本”(存卷十三至二十)，实同为书林魏家翻本^③。森《志》著录有“聿修堂藏有正德元年魏家重刊本”，该本当已刻在正德。

以上四种，底本字体均为元代建刻典型的柳体风格，明翻刻本有意追摹，但与底本的相似度依次降低，大致倾向是刊刻越晚的翻本，字体越趋于拙硬、板滞。王宗玉本卷一前数叶与原本相比，几无差别，卷二以下逐渐流露出明代摹仿体的本色，熊宗立本整体均为明代摹仿体，书林魏家本字体僵硬，刀法拙劣。

属于赵体字本系统的，列举四种：

《茅山志》，永乐间姚少师刻本，从元刻本翻出。吴寿暘《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三著录者为真元刻，卷四至七配明永乐翻本，卷十至十二、十四至十五配清抄本，今藏国图。又，台图藏本，存卷十至十一，有邓邦述题记，为元刻。《铁琴铜剑楼元本书影》著录之“元刻”实为永乐刻本，今藏国图。

《佛祖历代通载》，宣德五年(1430)大慈恩寺刻本，从元至正七年(1347)释念常募刻本翻出。书前至正元年虞集序后“虞伯生父”印文木记，“虞”字篆文有误，元刻本不误；又有凡例十三条，为元刻本所无；目录为一行二题，元刻本为一行一题；卷端叶无刊书人名，元刻本有“吴郡朱显卿刊”一行。沈德寿抱

①《山东省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齐鲁书社,2009年,第12页)收录该本书影。

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第1328号著录之“元刻本”，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藏，实为王刻，卷端四行为书贾割去。又，《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与此书情况类似，也有正统间翻刻本，出自元刻本，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01052号著录之绍兴图书馆藏“元刻本”即是翻本。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2073号著录之中医科学院藏“元至正五年陈志刻本”，实为明书林魏家翻本。

经楼旧藏宣德本一帙,卷一末镌有宣德五年岁次庚戌大慈恩寺募刻记,各卷末别有题记;后归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著录,今藏国图。王献唐旧藏一本,存五卷,今归山东省图书馆,题为元刻^①,该本卷六末有“大市门万佛禅寺住持日东中选刊”字样,实为宣德本。是书又有隆庆、万历之际翻本,卷端犹作赵书,正文已趋于方整,《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八、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二著录。观其文字,当从宣德本翻出。

《松雪斋文集》,天顺六年(1462)岳璿刻本,从元后至元五年(1339)花谿沈氏家塾刻本翻出。字体刻意力追赵书,面目酷肖底本。前人著录之“元刻”中,《涵芬楼烬馀书录》著录本为真元刻,今藏国图;徐如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卷上著录本,后归莫伯骥,载于《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集三,今藏国图;《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二著录者,今藏国图;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卷三十三著录者,又载于柳诒徵《益山书影》第二辑,今藏南京图书馆;《嘉业堂善本书影》著录者,今藏国图;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卷二著录者,今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故宫善本书影初编》著录者,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上六帙,皆为岳璿翻本。

《文心雕龙》,弘治十七年(1504)冯允中刻本,从元至正十五年(1355)嘉兴路儒学刻本翻出,底本纯用赵体上版,弘治翻本字体已趋方整,呈现出转型期的鲜明特点。《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一著录之“元刻本”,末有“吴人杨凤鸾写”一行,实为弘治本。

明代内府刻书,过去一向被归为赵体字系统。由于受到明代宫廷书法家沈度、沈粲的影响,已杂有沈氏笔意,与《茅山志》、《松雪斋文集》字体不尽相同。景泰七年(1456)内府刻本《饮膳正要》,从元天历刻本翻出,被认为是这种风格的产物。《四部丛刊》据以影印,误认为元刻本。

以上赵字本的翻刻者,身份都有官方背景,其中多为地方官员,有些甚至是朝廷中的名公巨卿。在明前期,赵字本符合官方美学的审美趣味,有些帝王本人就是赵书的爱好者和推广者,宣德皇帝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在东宫时,曾以赵体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据杨士奇记载,“廷臣之知文者,各赐一部,时不过三四人”^②。

二、明代各时期之翻版举隅

明代有国二百七十七年,所刻之书大致可分为四期:洪武至永乐为初期,宣德至成化为前期,弘治至嘉靖为中期,隆庆、万历以降为后期。

(一)初期

明王朝建立之初,曾借助地方的力量,翻刻宋元本书。陆深《中和堂随笔》

^①《山东省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第20页)收录该本书影,可参考。

^②杨士奇:《东里别集·圣谕录》。

载：“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进《南唐书》、《金史》、苏辙《古史》。初，上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令书坊刊行，至是，三书先成，进之。”^①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十四著录之马令《南唐书》“元刊本”，后归张蓉镜小娜嬛仙馆，书缺序目及第一卷，倩工补抄，有单学傅跋，方若衡题识（今藏国图）；《铁琴铜剑楼元本书影》史部六著录《金史》，“元至正间杭州路刊本”；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二著录《古史》，“明洪武刊小字本”。以上三书，当即《中和堂随笔》提及的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刻本。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明初刊本五种》文指出，《韵府群玉》、《唐文粹》、《欧阳文忠公集》三种与《辽史》、《金史》刻工多相合，当为洪武二十年前后福州地区所刻^②。与以上诸书为同一批刻工的，还有《南史》、《北史》^③、《三苏先生文集》等。

宋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二书，曾为浦玉田旧藏，后归仁和朱学勤，见于《别本结一庐书目》元版目，今藏上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元后至元三年（1337）刻本”，《中华再造善本》一期据以影印。该本的刻工大多参与过上举洪武本的刊刻，知为洪武福州翻本。《适园藏书志》卷六著录之“元刻本”，今藏台图；日本仓石武四郎编《旧京书影》第441-442页著录之“元刻本”，今藏国图。同为洪武翻本^④。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存卷二十至二十二，今藏山东省博物馆，旧题“元刻本”。刻工有虞子德、伯美、刘贯、江后等，为洪武福州翻本。

洪武福州地区的翻刻，所知已有十馀种之多，当时刊刻的实际数量当不止于此。字体带有摹仿元代官刻的意味，邓邦述称为“茂浑之气，固不可掩”^⑤。

这一时期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洪武蜀藩刻书。据《明史·诸王传》，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封庶十一子椿为蜀王，二十三年就藩成都府。蜀藩所刻之书，有一些很可能是以内府所颁宋、元本为底本，兼之摹刻甚精，故在传统著录中多被误认。列举三种：

《自警编》，洪武二十七年（1394）蜀藩刻本，从宋端平元年（1234）九江郡斋刻本翻出。宋讳缺笔不严。宋端平刻本，各藏家目录多见记载：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八著录者，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卷三著录者，后归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八著录，今藏台图；潘祖荫《滂喜斋藏

①转引自莫伯骥：《古史跋》，《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史二，叶一三八。

②《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三卷，汲古书院，昭和五十八年（1983），第331页。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200号著录之山东省博物馆藏“元大德信州路儒学刻本”《北史》，存十四卷，有刻工黄轩，实为洪武福州翻本。

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664号著录之山东省博物馆藏“宋绍定二年积德堂刻元至元重修本”、666号著录之浙江图书馆藏“元刻本”，同为此洪武翻本。

⑤邓邦述：《古史跋》，《群碧楼善本书录》卷一。

书记》卷二著录者,今藏上图;《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著录者,今藏国图;《嘉业堂善本书影》著录者,今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以上五本,同为洪武蜀藩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宋端平刻本”二帙,辽宁省图书馆藏,实同为洪武蜀藩刻本^①。是书又有明前期翻本、嘉靖七年蜀府翻本:《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宋本子部著录者,今藏国图,实为明前期翻刻本。《楹书隅录》卷三著录者,今藏国图;《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著录者,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实同为嘉靖七年蜀府翻刻本。

《皇朝仕学规范》,洪武蜀藩刻本,从宋淳熙三年(1176)刻本翻出。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二有方氏为此书作序云:“贤王殿下既重刻《自警编》以训国人,复取《仕学规范》,将刻以传示好学者。”知此书有洪武末年蜀藩刻本,或即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载之明蜀府刊本。各家著录之“宋刊本”,以张廷济藏本为最著。张本有明袁忠彻印、袁氏引《颜氏家训》六十五楷字长木记,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一著录,后归仁和朱学勤,《结一庐书目》列入宋版目,今归上图,潘景郑曾指为明刻^②。按此本字体方整板滞,标识句读与洪武刻《自警编》类似,版心下刻工名多与《自警编》相同,知为洪武蜀藩刻。其余各家所称之宋刻:《涵芬楼烬馀书录》著录者,今藏国图^③;《滂喜斋藏书记》卷二著录者,今藏上图;李盛铎木犀轩旧藏者(卷三十七至四十缺失,经人补抄完足),今藏国图。同属洪武蜀藩本。

《伊川击壤集》,洪武蜀藩刻本,从元刻本翻出。东莱刘占洪旧藏一帙,存卷一至十七,卷十八为补抄,有“益王图书”印,今藏国图,是为元刻之仅见者。《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著录之“宋本”,首尾完整,旧为汪士钟艺芸书舍插架物,后归张蓉镜,有张蓉镜、邵渊耀跋,今藏国图,版心所记之刻工多与《自警编》、《皇朝仕学规范》相同。字体规仿元刻,颇肖,而编叶之法与底本不同:卷一至十连续编码,卷十一至二十重起后连续编码。其余各家号为宋刊者: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著录本,为季振宜旧藏,存卷三至六,有抄配,黄丕烈、孙原湘、邵渊耀、钱天树等跋尾,继归张钧衡,《适园藏书记》卷十一著录;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卷四著录本,缺卷第一、二、三,有周良金、沈朗印;张乃熊《苕圃善本书目》著录本,有富察昌龄、于右任藏书印。以上三帙,现藏台图,日本学者阿部隆一氏定为“南宋末刊本”^④,台图至今沿袭著录。按三本之刻工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8149-8150号著录之辽宁图书馆藏“宋刻本”实与此同版,为洪武刻。

②潘景郑《明本仕学规范跋》举三证以明之:“全书文字遇宋讳无阙避,一也;标识句读,明人之陋习,宋槧所仅见,二也;书中每称一本作某者,淳熙原本,无需别据,三也。”(《著砚楼书跋》,第203页)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8123号以“宋刻本”著录。

④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汲古书院,昭和五十一年(1976),页C188-190。

与瞿藏本完全一致,知同为洪武翻本。是书又有明前期翻本,编叶之法悉同洪武本,当从彼本翻出。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八著录之“元本”,后归莫伯骥,载于《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集二,今藏国图,实即明前期翻本。

这一时期的翻元刻,另举二种:

《宋史·岳飞传》,附《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岳坟褒忠衍福寺复业记》、《重建褒忠衍福寺记》、《重建祠疏》等诗文,有“岁在己卯菊月住山僧高会重修”一行,刻工有金子中、陈仁甫、徐良。传世者凡有三帙,皆定为元刻:一清内阁大库旧藏本,《旧京书影》第357-360页收录有书影四页;一刘启瑞食旧德斋旧藏本,今归上海博物馆^①;一清怡府旧藏本,黄裳《来燕榭书跋》著录。曹元忠《笺经室古书题跋》云《岳飞传》系“取大德本《宋史》列传覆刻”,黄氏质疑:“元刻《宋史》,世未尝见,元忠安得知其为覆本乎?”^②又言金子中为元刻《宋史》刻工。按《宋史》为元至正五年江浙刻,“大德本”出自前人误说。谛观《岳飞传》字体,类明洪武摹仿体。遍检元刻《宋史》,刻工并无金子中,黄氏盖偶然误记。此当是洪武刻建文元年己卯增刻本。

《张仲景注解伤寒百证歌》五卷《新编张仲景注解伤寒发微论》二卷,宋许叔微述,钱遵王旧藏,后归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四定为“元刊本”,又归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九著录,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南京图书馆著录有元刻本,与陆藏本并非一刻。比勘二本,南图藏本为真元刻,陆藏本字类洪武福州翻本的摹仿体,为明初翻本。《铁琴铜剑楼元本书影》著录之“元刊本”《伤寒百证歌》,与陆藏本同版,今藏国图^③,疑同为明初翻本。

明初翻宋本,另举三种:

《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明初刻本,前有宋绍熙五年(1194)杜大珪序,原刻或为宋绍熙刊本。潘景郑先生曾指浙江图书馆收得孙氏寿松堂旧藏之“宋本”为明覆本^④,未言判断依据。今观浙图本,字体宽博古朴,为明初刻本体式,绝非宋刻。清以来流传藏家,沿称宋槧者,如《铁琴铜剑楼宋本书影》著录本,今藏国图;《皕宋楼藏书志》卷二十七、《仪顾堂题跋》卷四著录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滂喜斋藏书记》卷一著录者,今藏上图;《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一著录本,后归刘承幹,载于《嘉业堂善本书影》,存五十六卷,今藏台图,该馆《善本书目》以“宋建刊本”著录;《群碧楼善本书录》卷一著录本,今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曹元忠《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著录本,存八十三卷,今藏上海博物馆。皆与浙图藏本同版,属明初翻本。^⑤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5229号以“元至元六年刻本”著录,疑未确。

②黄裳:《来燕榭书跋》,第79页。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1934号著录为“元刻本”者即是。

④潘景郑:《明覆宋本名臣碑传琬琰集跋》,《著砚楼书跋》,第83页。

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4583-4586号以“宋刻元明递修本”著录者,与此同版。

《刘向新序》，明初刻本，字体风格与洪武楚府刻本《清江贝先生集》风格绝似，周弘祖《古今书刻》载有楚府本《新序》，疑此同为洪武楚府刻。卷四“宋就”一条，“恶是何可构怨祸之道也”，“构”字小字注云：“太上御名”，知源出宋孝宗朝刻本。是书又有正德五年楚府正心书院翻刻本，《嘉业堂善本书影》著录之“元刊本”，实为正德翻本，今藏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

《埤雅》，建文二年（1400）林瑜、陈大本赣州刻本，今藏国图。该书附有宋开庆元年陆经赣州郡斋刻本残纸三叶，与建文本行款悉同。《中国版刻图录》目录解题据此推断，建文本“源出宋开庆间赣州郡斋本”。该书也有明前期翻刻本，邓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二著录本，今藏上图；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著录本，今藏北大。以上二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建文二年赣州刻本，实为明前期翻本。

（二）前期

明前期翻元刻本，兹举五种：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天顺游明翻刻本，从元刻本翻出。季振宜旧藏本为真元刻，今归复旦大学图书馆。其余各家著录之“元刊本”，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九著录者，今藏上图，审为游明翻本。《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九、《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九著录本卷前有游明校正一行，知同为游明翻本。

《战国策》，明翻刻本，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平江路儒学刻本翻出。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今归国图，为真元刻，卷末有“至正乙巳前蓝山书院山长刘壖重校勘”木记一行，翻本依式照翻。沈复粲旧藏之“元槧本”（今藏上图）及陆氏韶宋楼、朱氏结一庐、刘氏嘉业堂著录之“元版”，实为明翻本。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翻刻本，从元至大三年（1310）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翻出。原本为黑口，四周双边，目录后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文牌记，浙江图书馆藏有原本，较初印。明翻本为白口，四周单边，目录后有“至大辛亥三月刻”篆文木记，字体拙劣，未详刊雕岁月，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莫友芝旧藏同版一帙，后归曹大铁，目录后已经书贾割补，伪钤印记，近年见于沪上拍卖市场，号为“元刻”^①。按《天禄琳琅书目》卷十著录明翻元本，云目录末叶版心有“正统二年己巳印”字样，莫绳孙据以定为“正统翻本”^②。今观其字体，似较正统更晚，姑附于此。

《雍虞先生道园类稿》，明翻刻本，从元至正五年（1345）抚州路儒学刻本翻出，字体较原本为拙。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著录之“元刊本”，

①上海嘉泰拍卖公司 2004 年秋拍第 499 号拍品。

②此条文字见于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通行本未加特别标识。傅嘉年先生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该书原稿本考知此条内容为莫绳孙续增，非莫友芝原文。见傅增湘：《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上，中华书局，1993 年，第 74 页。

有“濮阳李廷相书屋记”、“梁清远印”、“耿文光印”、“星垣”等印者,今藏国图^①;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五著录之“明初刻大字本”,有“蕉林梁氏书画”、“大学士章”等印者,后归董康,今藏台图。二者实为一刻,同属明翻本。

《道园学古录》,景泰七年(1456)郑逵、黄仕达昆山刻本,相传用元刻本黏版翻刻。《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群碧楼善本书目》卷二著录之“元刊本”,实同为此本。又有嘉靖翻本,摹刻颇肖,《四部丛刊》影印者即为嘉靖本,用景泰本补入数叶,而号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未确。

这一时期的翻宋本,列举六种:

《汉书》、《后汉书》,正统八年至十年刻本,属于十行十九字本系统,旧说翻自“景祐本”,实则以南宋末福州翻刻本为底本。袁芳瑛旧藏之“北宋淳化本”《两汉书》,赠予曾国藩。其中《汉书》有莫友芝手书跋,《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二著录,误定为“金元间刊本”,后归吴兴刘氏嘉业堂,今藏新疆大学图书馆;《后汉书》有袁芳瑛手书跋,今藏上图。实同为正统刻本。

《说苑》,明翻刻本,从宋咸淳元年(1265)镇江府学刻元明递修本翻出。宋咸淳本现存者所知凡二帙:一为朱学勤旧藏,《结一庐书目》著录,今藏上图;一为顾之逵旧藏,缺卷八至卷十三,黄氏《尧圃藏书题识》卷四著录,今藏国图。吴氏《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四著录之“宋刻”,今藏国图,黄丕烈认为是顾藏宋刻的重修后印本^②,审其字体,实为明翻本。

《朱子语类》,成化九年(1473)陈炜江西藩司刻本,从宋咸淳六年(1270)导江黎氏刻本翻出。《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卷十三著录“明刊本”,云为“明人翻雕本,一遵宋刻之旧”者即此,今藏国图。许博明《怀辛斋书目》著录之“宋刊本”,八十册,有“义门何氏家藏”、“岷瞻”印,今藏台图,实为成化九年陈炜刻本。陈本又有明翻刻本,从字体判断,款式相同,卷一未记板数,而卷二以下仍有板数。刊刻时间似距成化不远。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著录之“宋刊残本”实即此翻本,存六十一卷,今藏上图,《嘉业堂藏书志》(吴昌绶稿)称该本“槧刻古朴”,实则字体已草率不成样子。

《梦溪笔谈》,明翻宋本,从宋乾道二年(1166)扬州州学刻本翻出。宋乾道本旧说曾为彭元瑞收藏,有乾隆甲辰、嘉庆丙辰彭氏笔识二篇,经萧穆收藏^③,此后下落不明。各家著录之“宋乾道本”,如《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著录者,今在上图;《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七著录者,今在日本静嘉堂文库;《滂喜斋藏书记》著录者,今在上图。实同为此翻本。

《古文苑》,成化十八年(1482)张世用建阳刻本,从宋端平三年(1236)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第5499号著录为“元刻本”者即是。

②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四叶七。

③傅增湘《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上:“此书(宋乾道本)本藏汤竹儒,后为萧敬孚所有,复向人易他书。今持来售者,殆与敬孚交易者也。敬孚又言此虽宋刻,误字极多,且无《续》、《补》。”(第73页附注)

常州军刻本翻出。杨氏《宋存书室宋元秘书书目》、《海源阁藏书目》、《海源阁宋元秘书书目》均载有“宋本”、“十七卷十二册”，今藏台图，实为成化张世用刻本。张本又有明翻刻本，从字体判断，当刻在嘉靖中。成化本版心黑口，嘉靖本易为白口。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八著录之“元刊本”，收入柳诒徵《盇山书影》第二辑，实为嘉靖翻本。^①

《新雕宋朝文鉴》，天顺八年（1464）严州府刻本，从宋麻沙刘将仕宅刻本翻出。宋本部分卷次缺失，以明天顺刻本及抄本配补完整，李盛铎旧藏，《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著录，今藏北大，前有周必大“宋朝文鉴序”，吕祖谦奉旨诂次札子，首题“宋朝文鉴”；次“新雕宋朝文鉴总目”；次“新雕宋朝文鉴目录”。以上诸处，宋本皆题“皇朝”。总目后有“天顺八年冬严州府重刊”木记，弘治十七年（1504）胡韶补版印本汰去此记，前人多误为宋刻。韩应陛旧藏一帙，有顾如晋印、瓠菴吴氏珍藏印，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叶六一定为“宋刻元修本”，后归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十五以“宋刻明修本”著录，今藏台图，实即天顺刻弘治修补印本。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著录之“宋刊元修本”，同属天顺刻后印本。天顺本各卷卷首多有题“□□文鉴卷第几”者，初刻当作“皇朝”，卷二十二首题“皇朝文鉴”，卷一百三十八首题“圣宋文鉴”，犹依宋本，嘉靖五年晋藩养德书院翻刻本一律改题“宋文鉴”，致失真面。

宋末建阳书坊刻有《纂图互注六子》，有明前期翻本，列举以下二种：

《纂图互注荀子》，揆叙谦牧堂旧藏本、傅增湘跋本二种，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宋刻。上图藏有张元济跋本，与彼同版而多元代补版，为宋刻元修本。吴氏《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四著录之“元本”，后经清钟文烝手书跋语，继归刘承幹，今藏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馆，观其字体，实为明翻本。又《铁琴铜剑楼元本书影》著录本、《嘉业堂善本书影》著录本（莫绳孙旧藏，刘氏误题为“宋景定刊本”）与吴本同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之“元刻明修本”，冒广生跋，今藏上图，与吴本同版而又经明中期补版重印。严灵峰《无求备斋荀子集成》影印之“宋景定元年刊本”，与冒本同版，刷印情况相同。

《纂图互注南华真经》，上图有张元济跋本，卷中宋刻原版叶字迹漫漶，有补版，审其字体多为元刻，间有明补版叶，知为宋刻元明递修本。《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二著录之“元刊本”，又见于《盇山书影》第二辑，今归南京图书馆^②，与张本同版。《铁琴铜剑楼元本书影》著录者实为明翻本。《嘉业堂善本书影》著录之“宋刊本”、袁芳瑛卧雪庐旧藏之“北宋版”（经袁氏题跋，今藏上图），与瞿本同版^③。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第16875-16876号著录之“成化本”，实即嘉靖刻本。

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11720号收录此本，仍丁志之旧，以“元刻本”著录，疑未确。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11718号著录之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元建阳刻本”，即是此明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第360页）著录之“元刻”《纂图互注四子》，其中《南华真经》亦是此本。

(三) 中期

弘治至嘉靖间,仿宋风格渐盛,对明前期流行的柳体、赵体字形成冲击,逐渐改变了雕版的面貌,傅增湘称这一时期为“古今刻书雅俗变易之大关键”^①。

这一时期的翻元本,列举五种:

《汉隶分韵》,正德十一年刻本,从元刻本翻出。张嬖小婢嬛福地旧藏之“元刻”,今藏上图,实即正德翻本。

《六书正讹》,嘉靖元年(1522)于鏊刻本,从元至正十五年(1355)高德基等刻本翻出。《仪顾堂续跋》、《善本书室藏书志》、《盩山书影》第二辑著录之“元本”实同于于鏊翻本。

《说文原》,嘉靖元年于鏊刻本,从元至正十五年高德基等刻本翻出。《涵芬楼烬馀书录》著录之“元至正刻本”实即于鏊翻本。

《鄂国金佗粹编》、《续编》,嘉靖二十一年(1542)洪富刻本,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祐西湖书院刻明修本翻出。元刻本字体生动流美,翻本则趋于板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二著录之“元刻”,今藏上图,实即嘉靖翻本。

《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从元刻本翻出。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三载有元刊明印一本,大版细字,后归汪氏艺芸书舍,继归陆心源,《韶宋楼藏书志》卷三十四、《仪顾堂题跋》卷四著录;今藏日本静嘉堂,《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以元刻本著录。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载有宋版一本,后为袁克文收得,今藏国图,实与黄本为一刻。祁阳陈清华旧藏一本,今归国图,与黄本行款悉同,卷末有弘治癸亥贾宗刻书跋语。沈曾植题识乃误称“此即《仪顾堂题跋》所谓元槧《东京梦华录》也,末页贾宗跋,为陆氏、黄氏所未见,盖经书贾割去,故二君认为元槧”^②其说指不误为误,未可据信。

以下三种翻元版,鉴定中素有疑问,附记于下:

《古今韵会举要》,元刻本,今藏上图,卷前有陈棗刊书识语十行。《嘉业堂善本书影》所载之“元刻本”亦有此记,款式相同,与上图本不同版。比勘二本字体,前者当为元刻,后者已露明刊刻书本色,疑是正、嘉间翻本。《艺风藏书记》卷一著录之“元刊本”,有“拜经楼吴氏藏书印”、“千元十驾人家藏本”、“钟文烝印”、“文烝”、“子勤”、“白美”、“魏塘钟氏信美斋庚申以后所得书”、“读书本欲利行为文宜略识字”等印,今藏山东大学图书馆,与嘉业堂藏本同版,实为明刻。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元至大刻本,朱卧庵旧藏,为真元刻,今在台图;上海博物馆著录有“元刻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实为明翻本。是书另有嘉靖七年(1522)蒋旸刻本,上博本字体较蒋旸本为旧,疑刻在正德中^③。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86页。

②中国嘉德2004年秋拍《古籍善本》图录第2712号。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14593号著录之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七年蒋旸刻本”,实与上博本同版,疑为嘉靖以前翻本。

《潜室陈先生木钟集》，元建安吴氏友于堂刻本，今藏上图，目录后有“建安吴氏”鼎式木记、“友于堂刊”方形木记。浙江图书馆藏有一本，牌记款式相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以“明刻本”著录，定本误改为“元吴氏友于堂刻本”。审其字体，疑刻在弘、正之间^①。

这一时期的翻宋本，如王刻《史记》、袁刻《六家文选》、《世说新语》等，已为人所熟知，不再赘述。另举三种：

《春秋经传集解》，明翻宋淳熙三年（1176）闽山阮氏种德堂刻本。见于前人著录者实有甲、乙二种，行款相同：

一本字体方整，为嘉靖浙中刻本风貌，牌记末题“淳熙柔兆涓滩中夏初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季振宜《延令宋板书目》著录为宋本，后归朱氏结一庐，今藏上图，是为甲本。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载之“宋淳熙小字本”、瞿氏《铁琴铜剑楼宋本书影》著录之“宋刊本”实即此本。

一本字体为正、嘉间闽刻风貌，有淳熙三年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记，清人王存谿跋定为“宋刻元印”，今藏台图，是为乙本^②。

《九经白文》，明嘉靖刻本，从宋建刻巾箱本翻出。上栏标载音释，为宋本所无。刻工刘采、马相、章逵、陆天定、陆云、陆华、弓受之、王良等，为嘉靖间浙地良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定为“明靖江王府刊本”。吴氏《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一所记之“宋刻”，即为此本，后归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著录，又载于柳诒徵《益山书影》第一辑，今藏南京图书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著录之“宋刊”《九经》，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著录之“宋刊本《五经》白文”，有“怡亲王宝”等印，今藏北大；《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著录之“宋刊巾箱本《五经》”，有“曹溶之印”、“吟芬馆珍藏”、“杨绍和审定”、“聊城杨氏宋存书室珍藏”、“四经四史之斋”等印，今藏山东省博物馆；袁荣法《刚伐邑斋藏书志》著录之“宋板”《九经》，有“于氏小漠觴馆”、“于昌进鉴赏”、“伯夔”、“湘潭袁氏沧州藏书”、“玄冰室”、“玄冰室珍藏记”等印，今藏上图^③；《滂喜斋藏书记》卷一著录之“明刻巾箱本《五经》”，有“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怡府世宝”、“南浔董氏家藏”、“子孙保之”、“潘祖荫藏书记”等印，今藏上图。以上五帙与吴氏拜经楼藏本同版，为嘉靖翻本。又，王士禛称尝见“宋刻”小本《九经》于倪雁园检讨家，载《分甘馀话》。所见有倪灿批跋本，有“倪灿”、“师留”、“黄绢幼妇”、“宋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以“明刻本”著录，定本子部 653 号误附于“元吴氏友于堂刻本”下。

②《云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之“宋麻沙刻递修本”，实即乙本。书中有明宋濂等印，均属伪钤。

③袁荣法《刚伐邑斋藏书志》称该本“原题宋刊巾箱本，惟无音释，恐系宋板元印者”，实则坊贾将每叶上栏音释一一割去，编者不查，认为无音释本。

本”、“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积余秘籍识者宝之”等印,今在上图,盖即雁园所藏。细审之,则为此刻之修版后印者。

(四)后期

明后期之翻宋本,一向推崇祯六年(1633)赵均小宛堂刻本《玉台新咏》为最著,前人有误认。但据冯班跋称,赵氏所据为宋麻沙本,行款参差不齐,赵刻已整齐一番,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又有《六经图》,万历四十三年(1615)卫承芳刻本,板幅宽大。有“鲁斋”、“谦牧堂藏书记”等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著录为宋版。旧藏长春伪宫,1945年散出,流落海外,近年见于北京拍卖市场^①。万历中尚有吴继仕、郭若维二刻,款式相仿,前人亦有诤为宋本者。

以上列举了明代翻刻本而被错认版本的书近六十种(再翻版不计算在内)。类似的、令人迷惑的例子还有一些,但在收藏史上出现过问题的品种已尽力搜罗在内,所以这一清单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三、传统著录出现误鉴之原因试探

传统著录在宋、元版鉴定上失误多有,是否是明代翻版的摹真水平太高,以至于后人无从分辨?笔者将上举明代翻版与其原本的书影并列放置,对其字体形态一一比照,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近六十种书中,摹刻达到乱真程度的翻版只是极少数,具体说来,只有《茅山志》、《佛祖历代通载》、《松雪斋文集》三种而已,其他翻版或多或少均流露出明刊本色(王宗玉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是较为极端的例子,该本开卷的一小部分较为逼肖原本,余者形态差异仍然很大),有些甚至呈现为某一时期的通行体式(比如《张仲景注解伤寒百证歌》、《古文苑》、《新雕宋朝文鉴》、《九经白文》等)。只要对明版字体的时代特色及摹仿体可能出现的变化有所了解,我们应该可以将其与宋、元版区分开来。所以,传统著录之状况频出,鉴定者观风望气的水平不足恐怕是主要原因。

观风望气作为版本研究的一项基本功,其原理是类型学。真正有意识地利用类型学理论来建立版刻的时空框架,从而指导人们更准确地鉴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②。清代与民国的不少藏书家客观上因藏书私有而难于取阅比对,主观上没有找到观察版刻形态的科学方法,这是历史条件所限,无法苛责。但在今天古籍善本多归公藏、研究条件已大为改善的前提下,上举的一些鱼目混珠的情况仍不时出现,值得引起重视。

近年中国大陆有申报与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举,已公布了三期。从各馆申报的情况来看,尤以本文所举这类翻版误鉴最为集中,这同样反映了

^①北京嘉德拍卖公司2009年春拍第2864号拍品。

^②郭立喧:《〈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的再认识》,《东亚出版文化研究·星月夜》,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2010年,第379-384页。

一些从业人员基本功的不扎实。经过评审专家核查,已经改正了不少错误,但仍有一些漏网之鱼,需要研究者继续认真排查,去伪存真。

结 语

清以来的藏书著录,是前辈学者精力所萃,能启发今人之处不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本文在覆核实物的基础上,初步列出一份前人误认为宋、元版的明代翻版清单,并尝试对产生错误的原因作探究。传统的某些误鉴至今仍被一再沿袭,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版本学在研究视野上存在局部盲区,另一方面反映出在目前的版本教学中,我们提倡的研究方法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具体表现为轻视对从业者进行版刻形态观察、比较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当然,这涉及到对版本学方法的理解,不能强求意见统一。但无论如何,多接触上文所举的这类翻版,多与原版作比对,对业务人员提高鉴别的眼力是有帮助的。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